

美國研究

第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

二十世紀的美國史學

孫 同 勳

前 言

美國是一個一直在變動中的國家。從十三個不相關聯的殖民地到高度統一國家，從荒野到都市，從農業到工業，從農村文明到都市文明，從微不足道的三流國家到世界領導地位，這些巨大的改變都在短短的二百餘年中完成。迅速的改變使舊秩序破壞，新秩序代興，新舊交替之間，美國人感覺到迷亂與混淆，於是他們就轉向歷史去尋求對現狀的了解與對未來的指標。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的歷史研究也就變動不居，隨時代思潮而移轉。自十九世紀末年職業歷史學家開始把歷史當作一門嚴肅的科學去研究到今天，不足百年之間，有關美國歷史的一般解釋却已數經變動。任何一種解釋很難以維持三十年而不被批評或取代。從二十世紀初的進步派史學經五十年代的新保守派史學到六十年代的新左派史學，其間的變遷顯而易見。而且這些改變與當時的思想環境有着顯然而密切的關係。本文的主旨，即在簡單的介紹這些歷史解釋的轉變，它們的時代背景，以及它們的主要內容，並試舉數例以作說明。但此處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其一是當某一歷史解釋盛行時，並非是說沒有異見存在，只不過持異見的史學家屬於少數，他們的意見立於史學思潮的主流之外，不受人重視。其二是

美國歷史作品衆多，而本文作者又學陋識淺，不能遍讀諸書，所以所舉的例子容有偏失，不能恰到好处。

進步派史學

一直到十九世紀快結束時為止，美國歷史的研究還仍掌握在「業餘」史學家手中。他們的研究範圍只限於憲政史與戰爭史；研究重點在大人物與特殊事件；敘述則特重文采生動。正如 Richard Hofstadter 所指出的一樣，他們是浪漫派史家。¹ 但自一八八〇年代起由於各大學之先後設置歷史講座，到二十世紀開始時已出現了若干受過專門訓練的職業歷史學家，使史學逐漸脫離文學而成爲一專門獨立的學問。在這一方面 Herbert Baxter Adams 在霍浦金斯大學所主持的研討班貢獻最大。在他的領導下，研究生們抱持着自德國輸入的「科學的歷史」理想，客觀的從故紙堆裏去發掘憲政演變的「事實」。他們輕視業餘浪漫史學作品中的偏見與情感因素。Adams 的努力使美國的歷史研究不但專業化而且也科學化。

但緊隨着歷史研究之專業化與科學化，一派新專業史學家出現，否認「科學的歷史」之可能性。他們說在研究過去時，一個歷史學家絕不可能完全客觀。他們呼籲史學家必須把視界放寬，注意政治以外的其他因素。他們特別強調史學研究之實用性與工具性。這一派歷史學通常被稱之爲進步史學 (Progressive history) 或新史學 (New history)。此一史學派的解釋構成二十世紀最初三十年有關美國史研究的主流。

進步史學派的興起與得勢有其客觀的時代背景。約自一八七〇到一八九〇這二十年中，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美國思想界的時候。由於它的刺激，美國的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經濟學、與人類學，都大大的發展，學者們都利用科學方法致力於追求一般的演進原則。² 這些社會科學的進步大大的擴大了人類知

¹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1968). pp. 7-35.

²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Robert Allen Skotheim,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6), pp. 67-71.

識領域。史學家的視界也隨着大大的擴大了。他們了解到人類行為之複雜，可供研究題目之廣泛。不僅政治，即人類的思想、行為、與制度也都是歷史研究的正當範圍。與知識領域擴大之同時，美國思想界發生了一次對空洞形式主義的普遍反動，而趨向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Oliver Wendell Holmes 的法學經驗主義，Thorstein Veblen 的經濟制度主義，William James 的實用主義，與 John Dewey 的工具主義都是在捨棄過去那種先驗的邏輯形式主義，轉而強調經驗、實用、與現實的重要。³ 受了這種新思潮的激盪，歷史的研究趨向實用的工具主義乃是自然的事。但是使進步史學崛起的最重要原因還是當時的改革潮流。原來自內戰以後，急遽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引起社會不安，財富與權利的不均分配使被迫受害者因憤怒而反抗。自一八七〇起工人罷工越來越激烈，農民們也進行有組織的抗議，出身於中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也投身於此廣泛的改革運動。到二十世紀初所有的改革者就匯而為一而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政治改革運動，此即進步運動 (Progressive Movement)。所以從一八七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美國歷史上一個強調不斷進步的巨大改革運動時代。進步史學的幾位代表人物如 James H. Robinson, Charles A. Beard, Carl L. Becker, Vernon L. Parrington 與 Frederick J. Turner 等不但其成年期適當此改革思潮盛行之時，而且都是來自農民運動最激烈的中西部 (Middle West)。⁴ 因此他們之同情農民，他們之欲以歷史研究為改革工具，毫無疑問的有其時代背景。

研究範圍之擴大，實用主義之強調，以及對進步改革之熱心結合起來構成進步派史學。

進步史學在歷史研究的理論上有其獨特的主張。他們宣稱史

³ Morton White,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 (Boston, 1947),

⁴ Robinson 於一八六三年出生於 Illinois, Beard 於一八七四年出生於 Indiana, Becker 於一八七三年出生於 Iowa, Parrington 於一八七一年出生於 Illinois, Turner 於一八六一年出生於 Wisconsin。

學家在作研究工作時永遠不可能完全客觀，因為在他們選擇資料與處理過去事件時無可避免的受個人與時代流行偏見的影響。資料本身是死的，永遠不能自行顯示事實，它們的意義都是歷史學家給加上去的。他們更進一步指出研究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好奇，不是為了過去而研究過去。歷史研究有其實用的價值。Robinson 認為歷史研究的功用是在使我們透過對過去狀況及其後演變過程之解釋，以了解我們所處的現狀。只有透過分析現在之所以為現在，我們才能發現現狀中的缺點，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確途徑。Beard 與 Becker 雖然不像 Robinson 一樣率直的把歷史研究轉作改革的工具，但其討論分析的結論却並無不同。這兩人都認為歷史學家在選擇、安排與解釋史料時都無可避免的受存在於腦海中主觀因素——Beard 稱之為“frame of reference”——的支配，而此主觀因素含有一些可資期望的東西（things deemed desirable）。可資期望的東西自然牽涉到對現狀的不滿，對未來的期望。因此，歷史研究勢難避免成為實現理想的工具。這種主觀主義，當代主義（presentism）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到 Becker 手中就發展為一種環境相對論（environmental relativism）。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其流行的偏見，當客觀環境改變時，流行的偏見也隨之改變，前一個時代的歷史作品就不能適合後一個時代的需要，此一新時代必需根據其流行的偏見與好惡改寫過去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研究才能對當代發生影響，才能協助改革，加速進步。所以我們可以說當代主義，實用主義，與環境相對論是有其邏輯上的必然關係的。⁵

⁵ 其實此三人的分析也有不同的地方。此處所述只是其共有的特點。進一步了解可參考下列作品：James H.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Essays Illustrating The Modern Historical Outlook* (New York; 1912); Charles A. Beard, "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這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對美國歷史學會所發表的會長演說詞，後刊登在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XXIX (1934), 219-229; "That Noble Drea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XLI (1935), 74-87; 以及 Carl Becker 的三篇文章："Some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oblems Upo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VIII (March, 1913). "Everyman His Own Histq-

進步史學家對歷史研究的範圍與方法也有不同的看法。Robinson 認為歷史研究不應再像過去那樣只注意歷史上那些英雄式的與浪漫的特殊事件或人物。歷史學家的責任是重建過去的一般狀況及其後來的演變過程，因此他必須去了解一般人，他們的思想與動機，以及所處的社會與經濟狀況。Robinson 完全否定了過去那種英雄傳記式與帝王家譜式的政治與戰爭史的價值，而強調社會史、經濟史、與思想史的重要。他特別重視思想史，因為他認為思想史可以使我們發現當代的那些觀念已陳舊失效，阻碍進步，也最易鼓勵富有創造性的新觀念。但是要作如此廣泛的深入探討，過去那種敘述式的研究方法當然不能合用。因此歷史學家必須使用新方法，此即利用其他社會科學所提供的原則與知識。⁶ Turner 也作同樣的呼籲。⁷ 而 Beard, Becker 與 Parrington 等人則力圖將此主張實施，分別致力於經濟史、社會史、與思想史之研究。

Robinson 雖是第一個倡導新史學的人，他却並沒有把他的新理論與新方法實際運用到美國史的研究上去。他的主要興趣在歐洲思想史。晚年更因致力教育，即使在歐洲史方面也少有作品發表。但是其他的新史學家却都致力於美國史研究，而且獨自成家。Turner 的邊疆論，Becker 的雙重革命論，Beard 的經濟決定論，以及 Parrington 對美國思想的研究使美國史研究呈現一片蓬勃的新氣象。這些人的研究範圍雖有不同，但他們的作品却顯示一共通的特點，此即自對立的兩個集團的衝突來解釋美國歷史的發展。通常他們把美國史描寫成由一不民主的社會演進

rian,” 原是一九三一年美國歷史學會會長演說詞，後收在其本人論文集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Essay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35), pp. 233-255; “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 原為在一九二六年所宣讀的一篇論文，後收在 Hans Meyerhoff, e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 (New York, 1939), pp. 120-137.

⁶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pp. 70-131.

⁷ Frederick J. Turner,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原為一九一四年對美國歷史學會所作的會長演說詞，後收在其本人論文集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0), pp. 311-334.

到民主社會的過程，而演進的力量則是相對兩集團間的衝突與鬭爭。對立的兩集團有時是農民與資本家，有時是新興的西部邊地與東部較老地區。但有時他們又把階級觀念與地區觀念結合為一，於是相對立的兩集團就成為居住在西部新興邊地的負債農民與居住在東部較老地區的放債資本家。通常西部農民是被迫害份子，要求較大的平等與民主，東部的資本家是少數統治階級，希望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前者是進步的，後者是保守的。現在讓我們舉幾個例子以見此一衝突原則之實際應用。

衝突的原則首先被 Turner 融於他的邊疆論中。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召開的美國歷史學會的年會上，他宣讀了他劃時代的論文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向西不斷推進的邊疆地帶，是使美國文明不同於他國的主要原因。邊疆地區的原始生活條件剝光了移居者原有的歐洲文明，而在適應與克服邊疆生存狀況的過程中，這些邊地居民逐漸發展了一種獨特的美國生活方式，其特質是個人主義與民主制度。邊疆上的居民極大部份都是自耕的小農，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他們都受東部地區的資本家或富有階級的壓迫，因此東西之間的衝突就難以避免。他說：「我們可以追尋資本家與民主拓荒者之間的衝突一直到最初的殖民時期」，⁸ 這一種衝突就成為 Turner 解釋邊地消失之前美國整個歷史的中心觀念。

稍後，Becker 以衝突觀念為基礎而提出了一個雙重革命的主張。他說：「美國革命是兩個普遍運動的結果，此即自治與獨立之爭取，以及政治與社會民主化。在這兩個運動中，後者最為根本；它在爭取自治運動開始之前即已開始，而在獨立之後始得完成。」⁹ Becker 指出在革命前夕紐約的社會既不公平也不民主。其時紐約社會有三個階級存在，最上層是少數的貴族，他們

⁸ Turner, "Social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Reprinted in *ibid.*, P. 325.

⁹ Carl Beck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1760-1776* (Madison, Wisconsin, 1909), p. 5.

控制了紐約的政治與經濟；中間是由自由人與小地主構成的中產階級，他們具有投票權，但所佔全人口的比例不及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沒有投票權的窮人，他們構成殖民地紐約的最下層階級。中下階級的人抗議貴族階級的壟斷政權，要求獨立與民主。而貴族階級為維持既得利益堅決反對。但是鬭爭的結果是貴族集團失敗了，紐約也參加了革命。

Becker 解釋了紐約之參加革命，但却未繼續說明爭取民主的運動在獨立以後的發展。關於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從 Beard 的研究中找到一點消息。Beard 不但把 Becker 的雙重革命論擴大到全國，而且他的解釋也略有不同。Becker 並沒有明白指出紐約的階級衝突是基於經濟利害，Beard 則從經濟觀點來說明階級區分與經濟利害在政治上的衝突。他認為社會的進步是由社會中對立衝突的經濟利益集團所促成的。根據此一想法，他着手分析一七八七年美國的不同經濟利益集團。他首先把財富區分為動產 (personalty) 與不動產 (realty)，再把不動產具有者分為三類。其中最大多數是小農民，通常居住在邊地，都是負債者；另一種是居住在哈德遜河谷地帶的大地主，在基本上他們反對具有動產的人，同情小農民們的政治要求；第三種是南方蓄奴的大莊園主，其中多數同時具有奴隸以外的其他型式動產，故在利害上與北方的富商比較接近。Beard 又把擁有動產的人分為四類，即具有現金的人，具有公債券的人，製造家，以及貿易與海運業者。根據他的分析，一七八七年的新憲法，除南方大地主外，對其他不動產所有者都不利，而對動產所有者有利。實際上一七八七年的立憲運動是由具有動產的人所發起的一個運動，其目的是在建立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來保護與增進他們的私人經濟利益。制憲大會代表的選舉與憲法草案的批准都是以不民主的方式完成，農民曾多方反對而無效。總而言之，在 Beard 的筆下，新聯邦憲法成為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中，由少數具有影響力的動產所有者，為了其本身的經濟利益，用不民主的手段強加給農民們的一個

經濟文件。¹⁰ Beard 不但用經濟集團之衝突來解釋新聯邦憲法之形成，而且也用以解釋美國政黨政治的崛起。他認為政黨政治之起源是東部資本家與西部小農民之爭。他化了不少氣力證明領導立憲運動與支持批准憲法草案的人——即the Federalists——在新政府成立之後都成為支持 Alexander Hamilton 經濟計劃的人。那些在憲法草案批准鬭爭中失敗的小農民們則因反對此一計劃而擁護 Thomas Jefferson，構成共和黨 (The Republicans)。所以美國第一次政黨政治的出現有其深遠的經濟背景，Hamilton 與 Jefferson 的對立也就代表着資本家與小農民的衝突。¹¹ 這種經濟利益的衝突也是其後歷史大事發生的根本原因。傑克遜民主 (Jacksonian Democracy) 被描寫為農民與工人的勝利；內戰被認為是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的鬭爭。由於工業的北方獲得勝利，工業資本主義控制了戰後美國的政治與經濟。為工商大亨所控制的共和黨成為資本家增進其自身利益的工具，最後在國內終於引起小農民與工人階級的反抗，在國外造成一八九〇年代的帝國主義擴張。¹² 顯然 Beard 是企圖以經濟利益的衝突來解釋美國全部歷史發展。

Beard 把 Becker 的社會革命與 Turner 的邊疆理論在他自己的經濟決定論上結合一起，而形成了他的社會經濟區分 (socio economic division)，使東部的資本家與蓄奴的莊園主結合成一集團，共同對付西部邊地上負債小農——有時加上都市工人——的攻擊。以經濟為基礎的衝突史觀得以成立。但到 Parrington 手裏表現在政治上的衝突轉而為表現在觀念上的衝突，雖然觀念上的衝突還仍是起自於對立的社會、經濟與地區因素。他把美國思想史描寫成民主自由的伸長，其推動力量則是傑佛遜民主主義

¹⁰ Charles A. Beard,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13).

¹¹ Charles A. Bear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15).

¹² 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27).

(Jeffersonian democracy) 與漢彌頓資本貴族制 (Hamiltonian capitalist aristocracy) 之爭勝。他解釋美國的自由民主主義如何承自歐洲的理性運動；如何與清教思想 (Puritanism) 鬭爭；如何在 Jefferson 與 Jackson 所代表的農民民主勝利時期發揚光大；內戰前它如何得到浪漫主義的鼓勵繼續與以剝削為主的資本主義鬭爭；以及內戰後它如何對付工業資本主義與機械論者的悲觀主義 (mechanistic pessimism) 之聯合挑戰。Parrington 研究的雖是思想史，但他顯然認為觀念的背後有社會與經濟基礎，因為他通常把農民描寫為自由與民主的鬭士，而把東部富有的上層階級描寫為貪慾無窮的資本家。¹³ 所以自由民主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實際上就是西部小農與東部資本家在觀念上的衝突。

除以上這幾位進步派史學大師之外，還有許多同時期的其他歷史學家也同樣的強調衝突史觀。如 Merrill Jensen 以無參政權的內地小農以及東部城市中無產階級，與獨佔政權的南方東部的富有大莊園主以及北方東部的大商人之間的對立來解釋美國的革命；¹⁴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則以小農與工人聯合攻擊東部資本家的特權與獨佔來解釋傑克遜民主運動的崛起；¹⁵ 而進步史學最後一位大師 Merle Curti 則以進步的改革觀念與保守的反改革觀念的衝突試圖解釋美國思想的發展。¹⁶

其實在進步史學盛行的時候，極大部份的史學家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二分的衝突史觀，以上所舉不過是幾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而已。但即從此極少的例子中我們已可窺見進步史學派如何解釋美國的歷史發展。但二分的衝突論只不過是進步史學的特徵之

¹³ Vernon L.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Vol. I, *The Colonial Mind, 1620-1800* (New York, 1927); Vol. II,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in America, 1800-1860* (New York, 1927); Vol. III, *The Beginnings of Critical Realism in America, 1860-1920* (New York, 1930).

¹⁴ Merrill Jensen,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c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4-1781* (Madison, Wisconsin, 1940).

¹⁵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Age of Jackson* (Boston, 1945).

¹⁶ Merle Curti, *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1943).

一，其另一特徵是美國歷史的演進不是持續不斷的漸進，而是由若干劃時代的「突變」或「革命」所點綴。和 Beard 同類的史學家們特別注意歷史發展中的重大變革，而給這些轉捩點生動的描寫。他們認為美國史經歷數次革命，通常是自由民主的力量戰勝巨大的反對力量，但在勝利後却往往不能實現其全部理想。一七七六年的革命只不過是第一次革命，另外還有第二次革命，那就是南北內戰。Jefferson 的當選他們稱之為一八〇〇年的革命；Jackson 之得勢被認為是普通人的興起；當然他們不會放過工業革命。隨之而來的是「農民造反 (Populist Revolt)」。總而言之，對他們而言美國歷史上的大變動是進步的里程碑，當此時美國人放棄了不合時宜的舊信仰，改革舊制度，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

以對立兩個集團間的衝突來解釋美國歷史的進步史學派發軔於二十世紀初，大盛於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漸被攻擊與批評，到五〇年代遂為另一派史學所取代。進步派史學自然有其不可磨滅的成就與貢獻。它把歷史研究從政治史與軍事史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擴大了研究範圍，鼓勵歷史學家深入歷史的核心去探討政治活動背後的社會經濟動機。進步派史家也提出若干富有暗示性的解釋供後人去繼續探索。他們的努力也使歷史研究被確立為一門受尊重的嚴肅學問，不再是紳士們的玩物。但是另一方面進步史學也有無可彌補的缺點。把社會區分為兩個對立集團的二分法過份簡化了社會經濟因素的複雜性。過份集中注意於社會、經濟或邊疆使歷史學家易於忽略其他歷史因素，如宗教、外來文化或種族因素。革命史觀則抹殺了歷史演進中的一些持續不斷的傳統。最後，進步史學派的當代主義、實用主義與相對論更難免引誘歷史學家曲解歷史事件以符合當代需要。這些缺點都反而阻礙了對美國歷史實事求是的了解。因此，當美國人對改革運動感到厭倦時，這種以協助改革，強調進步為主旨的歷史研究就無可避免的被批評被揚棄了。

新保守派史學

批評與取代進步史學的是新保守史學派。此一派史學大盛於一九五〇年代與六〇年代之初。它以多元化代替二分法，以諧和代替衝突，以持續代替革命來解釋美國歷史的發展。這種解釋之改變自然有其時代背景。

一九三〇年代極權國家之崛起使美國一般思潮由進步轉向保守。意、德、日之極權侵略，德國對猶太人之殺戮，日本在談判中之偷襲珍珠港，戰後共匪之崛起，蘇俄之整肅異己，冷戰中原子毀滅之危機等等事件，對美國的思想一般說來發生兩種影響，其一是重新肯定美國自由民主傳統的永恒價值，其二是懷疑人性本善的說法。這兩個轉變都使進步史學的思想發生動搖。

在前面我們提到過，進步史派的歷史理論是環境相對論。自 Robinson 的當代主義經 Beard 的主觀主義到 Becker 手裏，環境相對論發展到頂端。這一觀念的極端含義是說人世一切都沒有永恒不變的價值。任何制度，任何觀念之是否有價值有意義，端賴其是否能適應當代的需要。需要既隨時代而變，則舊的必被揚棄，新的必待創造。Becker 也許沒有想到，在環境相對論之下，連他自己的相對觀念也不會持久，遲早會被修正或捨棄。而促使其消滅的主要力量是極權政權的崛起。軸心國家初期的勝利幾乎有消滅民主國家的可能，民主制度顯然面臨空前的威脅。面對着這一嚴重的威脅，美國的智識份子都轉而重新肯定美國民主傳統的永恒不變價值，期能在思想上對抗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譬如像所謂的「失落的一代 (The Lost Generation)」的文學作家們在一九二〇年代因討厭美國貪得無厭的商業文明，輕視美國的歷史傳統，寧肯流浪巴黎街頭也不願讓紐約的銅臭，芝加哥的鹹肉味，或小鎮上的假仁假義扼殺他們的創造天才，但到三〇年代他們却紛紛歸國而「重新擁抱美國 (The re-embarrassment of America)」。Van Wyck Brooks 與 John Dos Passos 等人在作品裏不再批評，反而大力頌揚美國自由與民

主的傳統。¹⁷ 在歷史研究方面，不但 Samuel Eliot Morison, Perry Miller 與 Ralph Gabriel 等頌揚美國傳統的作品吸引新的注意，¹⁸ 甚至連某些進步史學家也修正了他們的立場。Beard 在其所著 *The Republic* (1943) 一書中一反其過去的態度而對美國憲法表示無限敬意，他說製憲代表們的最大勝利是他們創造了立憲政府，避免了軍事獨裁政體。在另外一本書中他也強調觀念與價值的重要。他發現美國的歷史重心是「文明觀念」(the idea of civilization)。此一使美國不同於他國的觀念包括美國一切社會價值如民主、自由、進步等等。他暗示這些信仰具有永恒不變的偉大價值。¹⁹ 這和他以前專門注重非道德的經濟因素有多大的不同！Becker 也經歷同樣的修正。他在申述一組人類觀念的永恒價值時說，這些觀念雖包括民主觀念，但却比

「民主觀念更老更普遍，同時也不依賴民主觀念。它們有其自我獨存性，與任何特殊性的社會體系或文明類型都沒有關係。自佛祖、孔子、所羅門、左拉斯特、柏拉圖、亞力斯多德、蘇格拉底、與耶穌以降，人們都以這些觀念來衡量文明之進步或退步。」²⁰

Becker 此處雖沒有特別強調美國的民治傳統，但顯然他在說明人類歷史中若干絕對與普遍觀念的永恒不變價值。這與他自己的環境相對論的含義又是何等的不同！所以，不管是重新擁抱美國的自由民主傳統也好，不管是強調某些人類的普遍絕對的價值也好，既然美國智識份子都同意歷史中有若干價值與觀念並不隨着客觀環境而變，則環境相對論就自然站不住腳了。因此極權政權

¹⁷ Van Wyck Brooks,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1936); John Dos Passos, *The Ground we Stand on* (1941). 有關「失落的一代」之轉變請參閱 Malcolm Cowley, *Exile's Return* (New York, 1934).

¹⁸ Samuel Eliot Morison, *Builders of the Bay Colony* (1930); 與 *The Puritan Promises* (1936);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39), 與 *Orthodoxy in Massachusetts* (1932); Ralph Gabriel,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tic Thought* (1940). Skotheim 認為此三位歷史學家是新保守派的先驅，請參考其所著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pp. 173-255.

¹⁹ Charles A. Beard, *The American Spirit: A Study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2).

²⁰ Carl Becker, *New Liberties for Old* (1941), pp. 149-150.

之威脅瓦解了進步派史學的理论基礎。

極權之崛起及其不合人性的措施也使美國人不再醉心於不斷的進步觀念。美國的進步觀念原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信仰上。他們認為人性本質是善良的，具有無限的向善本能。因此只要把客觀環境改善使個人有充分發揮其本能的機會，則個人必將成為完人，社會必將成為地上的天國。因此只要不斷的改革，人類社會就會不斷的進步而到達完美之境。十九世紀的改革運動莫不強調此點。²¹ 進步派史學大師生長於這種氣氛之中，自然會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就因為他們相信人類性善與不斷進步之可能，所以才想把歷史研究轉變為推動改善與進步的工具。但是納粹帝國殺戮猶太人之殘酷，日本偷襲珍珠港之背信，共產國家清除異己與奴役人民之殘暴，以及對原子毀滅之恐懼，却使美國人由天真的樂觀轉為悲觀。他們開始懷疑人類本性究竟是善的還是惡的，人類究竟進步到天堂還是進步到地獄。

從神學方面批評進步主義對人性看法的有新正統派 (Neo-Orthodoxy) 的 Reinhold Niebuhr。他又恢復了原罪論，認為人類天性中充滿原罪，人類本能有其極限，不可能無限的改善。因此進步主義的看法在他看起來是太天真，太單純。²² 從經驗來批評的則更多。如 Walter Lippmann 即從自然律 (natural law) 觀點指出人類本能與社會進步有其極限。²³ 甚至自認為是進步主義承繼者的人也不得不作若干讓步。如 Schlesinger 雖然仍認為在某種範圍內人可以改善社會，但却不得不承認人性有其黑暗面。²⁴ 進步派最後的一位大師 Curti 一方面為進步主義辯護

²¹ 美國初起時地廣人稀，個人上升的機會比較大，故自開始進步觀念就很流行。而內戰前後復興宗教信仰運動 (Revivalism) 之強調人可與上帝直接交通，超越學派 (Transcendentalism) 之強調人性具有神性，更加强了進步觀念的流行。內戰後社會達爾文主義之主張演化論也有同樣的影響力。故整個十九世紀進步思想都一直盛行不衰。

²² Reinhold Niebuhr, "The Dilemma of Modern Man", *The Nation*, 164 (Feb., 1947).

²³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Boston, 1955).

²⁴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Boston, 1949).

，一方面却也承認進步派理想陳義太高，不得不稍加降低。²⁵ 對人性與人類本能比較保守的看法破壞了進步主義的哲學基礎。而以進步為重心的進步史學也就必然的成為批評與反動的犧牲品。

對美國歷史傳統之重新肯定與對人性之保守看法一方面使進步思潮走下坡路，一方面則鼓勵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sm) 之崛起。到一九五〇年代此一新思潮即大盛於美國。其在政治上的表現是艾森豪的中間路線，與麥加錫主義 (McCarthyism)；其在歷史研究上的表現則是新保守史學 (Neo-conservative History)。

新保守史學家所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所提出的解釋也非常龐雜，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各不相同，但是根據幾位歷史學者的分析，我們仍可發現此一新史派的共通特徵是甚麼。²⁶ 新保守派史學家們都強調歷史上意見與利害之和諧以及基本制度與價值體系之持續與穩定。他們通常都認為美國從開始就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對事物的基本看法及根本經濟利益差不多是一致的，因此階級、地區或觀念的二分對立不是當時人的錯覺就是後來歷史學家所創造的「神話」(myth)。有時他們也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外

²⁵ Merle Curti, "Human Nature in American Thought: The Retreat of Reas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Printed in *Probing our Past* (New York, 1955).

²⁶ 有關美國史學發展的作品甚多，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所附的 "Bibliographical Essay", pp. 467-498, 收集頗全，可供參考。唯大部份作品在臺灣無法看到。本文作者所能參考到的除前述 Hofstadter 一書外只有下列數種：John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原載 *Commentary*, XXVII (Feb., 1959), 93-100, 後收在 A. S.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6), I, 193-205; John Higham, "The Ris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VI (April, 1951), 453-471; Barton J. Bernstein, ed., *Toward A New Past: 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7), "Introduction," pp. v-xiii; Irwin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uly, 1967), 1237-1263; Robert Allen Skotheim,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ies and Historian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6); Lee Benson, *Turner and Beard: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Reconsidered* (New York, 1960). 本文即根據這幾種作品寫成。

在的衝突轉變為個人內心的衝突。因此進步派史家的不同羣體之間的對立，被保守派史家轉變為普遍化的個人心理緊張。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強調基本制度與傳統之不變性，着力於降低社會大變動的革命性。在他們筆底下，美國革命成為殖民地人民保持在大英帝國不成文法下所享受之自由與自治權的結果；而一八三〇時代的傑克遜民主運動，一八九〇時代的農民運動，二十世紀初的進步運動成為重建過去「黃金時代」的努力。那些不能降低的就加以忽略，新保守史家很少研究內戰史，這恐怕是因為他們發現這一巨變的革命性難以抹殺。總而言之，在新保守派史家的眼光中，美國歷史上沒有兩個集團之對立衝突，沒有與傳統完全脫節的革命性變動，有的只是和諧與持續不斷的傳統。這也正是他們被稱之為新保守派史學家的主要原因。

新保守派史家非常多，在這裏只能舉少數幾個例子以見他們如何解釋美國史。第一個例子是 Robert Brown。他是從和諧與持續觀點來研究革命史的一個主要歷史學家。他指出在革命前後美國已是一個由中產階級構成的社會；民主、平等與自治已是非常普遍。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府試圖限制與剝奪殖民地所享受的這些權利，殖民地人民於是起而反抗，當他們發現除獨立外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保持其久已享受的自由、自治與民主制度時，他們終至走上獨立之路。而立憲運動不過是他們試圖更有效的保障這些既得權利的努力而已。在獨立後無論政治與社會上都沒有發生重大的權力重新分配，革命前後社會並無顯著的不同。因此他攻擊進步史家的雙重革命論為毫無事實根據，他更嚴厲的批評 Beard 對立憲運動的研究，認為 Beard 在史料的運用上與研究方法上犯了嚴重的錯誤，結果使結論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²⁷ 另外一個批評 Beard 對憲法所作的經濟解釋的史學家是 Forrest McDonald。他指出 Beard 的解釋與事實不符。他的結論是憲

²⁷ Robert E. Brown, *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 1691-1780* (New York, 1955); Charles Beard and the Constitu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1956).

法是多種分歧意見的中和產物。制憲代表們爲了使殖民地的習慣與經驗能適應獨立後的新政治狀況，設計了幾個微不足道的創新，但除此之外憲法並沒有包含任何使美國人感覺新奇的規定。在這裏 McDonald 暗示憲法只不過把美國人久已習慣的東西加以正式的制度化而已。²⁸ 這種解釋顯然在強調傳統的持續性，以及減少革命與立憲的創新性。

關於傑克遜民主的研究非常多，但其共通的特點是否認經濟與社會衝突的重要。John William Ward 認爲傑克遜之得勢是因爲人民覺得他具體表現了他們的理想——自然、神意與個人意志。²⁹ Marvin Meyers 的解釋却更廣泛的爲學者所接受。他說在傑克遜崛起之前美國極大部份人都是中產階級，政治已非常民主，因此階級衝突不足以解釋何以傑克遜得到的支持只不過比敵黨較多而非全體。他發現傑克遜的得勢與許多美國人的內心矛盾有關。原來由於工業化，在一八三〇左右美國開始走上工業資本主義的路線，充滿了新的發財機會，每個人都渴望能利用新機會發財。但是他們對這種充滿冒險性的新興資本經濟缺乏心理上的準備，他們所嚮往的還是過去的那種單純質樸緩慢的農業社會與價值，因此心理發生矛盾與分裂，這種人——Meyers 稱之爲「冒險的保守份子」(adventurous conservatives)——的經濟利益使他們向前看，但倫理理想却使他們向後轉。傑克遜的政論主張限制資本家的影響力，重建個人平等經濟機會，恰好給予這些人一個逃避心理緊張的機會，因此他們都紛紛投到他的麾下。³⁰ Hofstadter 的解釋也同樣的忽視經濟或社會衝突。他自己雖然自認爲是一個自由份子，但他的作品却構成新保守史學作品的主要部份。他指出整個美國史恰與現代工業資本主義之崛起與流行相

²⁸ Forrest McDonald, *We the People: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Chicago, 1958).

²⁹ John William Ward, *Andrew Jackson: Symbol For an Age* (New York, 1953).

³⁰ 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 (New York, 1957).

吻合。任何像美國那樣已經創造物質繁榮的社會，都必有其潛在的一貫性。這樣的社會不可能產生一些於其基本安排不利的觀念。美國人有時對當前問題發生激烈爭論，但他們却都接受了一套共同的基本觀念，這一套基本觀念使他們在選舉之後仍能共同合作。而且這套被普遍接受的觀念並沒有隨時勢而經歷巨大的改變。總而言之，他認為在暫時與地方性的衝突之下，美國文化具有一貫與普遍的傳統。此一傳統即資本主義的內容，包括私有財產權，經濟個人主義，與自由競爭原則。根據此一觀點，Hofstadter 覺得美國史上的幾次政治運動就有着基本的一貫性。傑克遜的民主是渴望恢復自由競爭的新興小資本家的運動。一八九〇年時代的農民們事實上都已是為市場生產的小農業資本家，他們所面臨的經濟困難是國際農產市場價格跌落所造成的，但他們却誤認為是由工業金融大亨的壟斷所造成，因此那時的農民運動倡導打倒特權，消滅壟斷，恢復過去的自由競爭。Hofstadter 認為這種想法是一個「神話」，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而他的國際市場論輕輕的就把國內衝突消滅了。這一農民運動到二十世紀初即與城市中的改革者聯手而形成一全國性的政治改革運動，此即進步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何以城市中的改革者參加此一運動，Hofstadter 使用了一個新理論來解釋，此即「社會地位的變動」(status revolution)。David Donald 曾使用此一概念來解釋內戰前立即廢奴運動(Abolitionism)。⁸¹ Hofstadter 借用來分析進步運動領導者的動機。他說自一八七〇年以後由於工業的發展，美國社會上發生一次社會地位的大變動。一些工商金融資本大亨崛起，取代了原來紳士們，世襲的中小商人，小製造家，成名的自由業者在政治社會上的支配地位，獨佔了社會聲譽，社會地位，與影響力。被取代地位的一羣於是就領導政治改革運動，企圖限制或打倒新興資本大亨，以恢復原有的社會領導地位。所以在 Hofstadter 筆下，農民運動與進步運

⁸¹ David Donald, "Toward a Reconsideration of Abolitionism," in *Lincoln Reconsidered: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Era* (New York, 1947), pp. 19-36.

動不是自由或激進的改革，而是保守甚至反動的改革運動。³²

Hofstadter 的作品對美國史的研究有重大貢獻，但有意為美國史建立一保守傳統的不是他，而是 Daniel Boorstin。他在一本薄薄的書裏試圖為整個美國史樹立一新的架構。³³ 其他學者都惋惜美國缺乏一有系統的政治理論，以及美國人對抽象的政治理論缺乏興趣。Boorstin 不但不惋惜，反而認為那是美國的長處。他說美國人之對政治空談不感興趣那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論。此一信仰之基礎是「被給與性」(givenness)，即言美國的價值體系是由美國所特有的一些地理與歷史事實所授與的。此一「被給與」的感覺由三個因素所構成：一是相信美國的價值承自傳統，即言早期殖民人士與革命領袖為美國立定一萬世有效的傳統；二是相信價值來自當代的經驗，但却早已含攝在原有制度之中；三是相信美國歷史的持續不變性與和諧性。此一「被給與」的感覺在殖民時代即已存在，後來的革命與內戰不但都顯示此一感覺的作用，而且將之加強。但是十九世紀之末隨着邊地之消失，「被給與」的感覺開始衰退。此一衰退再加上國外極權政權的崛起，使一部份美國人覺得需要一整套的政治哲學來對抗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但Boorstin認為這樣做毫無用處。他覺得唯一有效的對抗辦法是去發現美國歷史的特質，然後將之保持與加強。當然他以為自己已經找到此一特質，那就是「被給與性」。如果我們把他的新奇名詞撇開，就可發現他所強調的只不過是美國歷史上沒有對敵，只有基本信仰的一致與持續，此一基本信仰對當代仍然有效，事實上是對抗極權威脅的最佳思想武器。所以在他的這本書裏，我們不但可以找到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理論，而且也可以發現新保守思潮崛起的原因。

強調和諧與持續的新保守史學有其貢獻，它彌補了進步史學

³²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1948);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 (New York, 1955).

³³ Daniel Boorstin, *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1953).

的若干缺失，使史學者更能注意客觀的研究態度與史料的正當運用，同時也重新發現美國史中那些不變的傳統因素。不過，由於偏重一方，新保守派史家也有不能避免的偏失，第一他們忽視美國史上那些自發的事件，第二他們不能嚴肅的處理觀念的衝突，不能充分了解富有創造性的新觀念之重要。³⁴ 任何只注意歷史演進單方面的史學是都不能避免有所偏失的。

新保守史學主要是對抗極權威脅的副產物。因此當客觀環境發生變動，一般思潮又趨向自由與改革時，新保守史學就成為批評攻擊的對象。而到一九六〇年時客觀情勢已與以前的十餘年大不相同。日、德極權早被摧毀，他們的非行在年輕一代的腦海中已灰黯模糊，共產集團與民主集團間的衝突日漸鬆弛，對原子毀滅的恐懼隨着冷戰的緩和而大大減小。當美國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有心情再回觀國內的情勢時，他們發現若干亟待改革的不合理處。在富足繁榮的社會裏居然仍有許多美國人在匱乏饑餓中掙扎，在一個以平等民主自傲的國家裏居然仍有次等公民在忍受歧視，一個鼓吹和平與民族自決的人民居然派兵干涉他國內政。理想與現狀之不符，使年輕一代的美國人特別不能忍耐，於是隨着甘乃迪之當選，強調改革的自由主義再度抬頭。在校園裏，在貧民窟中，在少數集團間，激進的年青改革者唱出反饑餓，反歧視，反侵略，反資本主義的口號。美國的自由主義走上極端激進的路子。激進的自由份子發現前一代那種自以為是的保守史學不合他們的需要，於是從批評進而企圖建立一歷史激進傳統，作為改革的歷史基礎，其結果是新左派史學 (New-Left History) 的興起。

新左派史學

正如新保守派史學之崛起是以批評其先驅進步史學為開始，新左派史學也是以批評其先驅新保守史學起家。年輕的激進份子

³⁴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in A. S.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I, 204.

覺得新保守史學至少有三點是他們不能接受的。第一他們不能忍受新保守史學的政治保守主義。他們覺得新保守史學的研究是在盲目的歌頌美國，助長貴族階級對社會之支配。第二他們也不能忍受新保守史家的影響力，他們認為這些保守史學家控制了東部幾所著名的大學，使用此一「學閥」力量打擊異端份子，鼓勵服從。第三是他們覺得前一代的史家沒有為他們提供一「可用的過去」。³⁵ 他們發現新左派運動需要一歷史傳統為基礎。但是新保守史學只注意過去的和諧與持續，抹殺了激進觀念，對新左派運動毫無幫助。他們需要為自己建立一激進的改革傳統。由於以上三個原因，激進的年輕史學家一方面批評攻擊新保守史學家，一方面則致力於重建美國史解釋，以適合自己的需要。

新左派史家雖然大致同意不能接受些什麼，但却不能同意應該接受些什麼。他們之間意見的紛歧非常的普遍，也非常強烈。並且新左派史學剛在萌芽，還沒有發展出一成熟的解釋系統，供人分析。但是要想找出其共同的地方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大體說來，他們接受馬克斯的方法，但却試圖將之美國化。一方面承認馬克斯的歷史法則有其普遍使用性，另一方面則認為這些法則因不同地方之不同社會因素而有不同的作用。³⁶ 因為馬克斯強調階級區分，所以新左派史學很自然的接受 Beard 的歷史解釋，也就跟着強調美國歷史上因經濟利益所引起的衝突。不過他們的尊奉馬克斯與 Beard 並非是完全盲目的。在這兩人所提供的大原則下，新左派史家常提出不同的意見，有時甚至不免施行抨擊。

據 Unger 的意見，第一個試圖綜合解釋美國史的新左派史家是 William A. Williams。³⁷ 一九六一他出版了一部作品稱之為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這本書的主旨是以

³⁵ Irwin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uly, 1967), 1242-1245. 本節之討論主要取自這篇文章。

³⁶ Harold Cruce, "Americanizing the Radical Program", *Studies on the Left*, III (Winter, 1963).

³⁷ Unger, "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II (July, 1967), 1244-1249.

重視社會福利的重商主義與重視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之間的對立來解釋整個美國史。但是這本書對年輕一代研究社會史的新左派史學者究竟發生多大的作用很難說。Williams 之極力攻擊個人主義與極力讚揚重視社會全體的重商主義適合新左派的口味，但他同時也證明在過去美國人一致尊重私有財產權，以及強調觀念的重要，忽略經濟因素，這些却不能為年輕激進的史家所接受。他對新左派的最大影響是在外交史的研究上，在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1959) 中 Williams 把 Turner 的邊疆論擴大，而用來解釋整個美國外交史。從一開始美國就是一個主張擴張主義的國家，一意宰割弱小的鄰國，以達發財美夢。先是驅逐印第安人以佔奪他們的土地，當北美大陸的空地被佔光時，於是美國侵略的矛頭就轉向其他鄰國，當武力不能達到目的時，就使用經濟力量以征服經濟的邊疆。總之，整部美國外交史就是一部資本帝國主義擴張史。這一解釋對他的學生們發生重大影響。其中最成功的一個是 Walter LaFeber。他的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 (Ithaca, New York, 1963) 曾贏得一九六二年美國歷史學會的一個大獎。它的主要內容是一八九〇時代的美國帝國主義既不是一個偶發事件也不是一個新的開端。事實上那是內戰以後持續發展的結果，而且此一發展的根本是經濟。工業製造能力的增加迫使工業家向外尋找原料與市場。這是一八九〇時代帝國擴張的根本原因。LaFeber 的分析研究還相當的冷靜與客觀，但 Williams 其他學生就不免失之偏激。在 John W. Rollins 筆下甚至那些曾反對殖民主義的人也成為帝國主義者，因為他們也支持經濟滲透。Lloyd Gardner 則認為美國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軸心國家不願意接受美國對自由貿易與世界性的門戶開放之要求。³⁸ 新左派的外交史研究大肆攻擊美國的資本帝國主義，同時讚揚孤立

³⁸ John W. Rollins, "The Anti-Imperialists an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tudies on the Left*, III, (No. 1, 1962); Lloyd Gardner, "From New Deal to New Frontier, 1937-1941," *Studies on the Left*, I (Fall, 1959).

主義。他們給予一些孤立主義者如 William Borah 特別的稱讚。³⁹ 這些作品的共有特徵是強調美國外交史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資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這種解釋顯然是年輕的激進份子把他們對冷戰的恐懼，對戰爭的反對投射到歷史上一種結果。

在政治與社會史研究方面，新左派史家多半強調經濟衝突，並且同情不幸者與被壓迫者。Jesse Lemish 對革命史的研究等於是 Beard 與 Becker 等人雙重革命論的翻版。他指出新保守史家只注意到少數革命領袖們的意見諧和，因而否認內部社會革命的存在。其實在殖民社會中，名流之下還有廣大的羣衆，他們不但受英國統治政策的迫害，也受殖民地領袖的不公統治。所以從殖民地一開始就有貧窮的下等階級與富有的上等階級之爭。貧窮的下等階級都自發自動的參加革命，所以革命的發生與他們大有關係。但是以名流爲中心的歷史研究却不屑注意這些下等人。他大聲呼籲現在應該從社會底部來研究革命史，所得的結果也許要比從社會頂端研究所得的結論更接近事實。⁴⁰ 在對紐約州一個郡的研究中 Staughton Lynd 發現大商人和大地主與由小鄉紳所領導的農民在憲法草案批准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的衝突與鬭爭。⁴¹ Michael Lebowitz 則批評 Meyers 用心理矛盾來解釋傑克遜民主之不合實際。他指出交通的發展使某些地區——主要是東部較老地區——的農業衰退，而工業化則使原來受尊重的技匠與普通工人的社會與經濟地位惡化，這些衰退的農民與工人因對現狀不滿，而支持以打擊資本特權與壟斷爲號召的傑克遜，經濟利害的衝突是顯而易見的。⁴² Douglas Miller 則率直的指出在傑克遜

³⁹ Orde S. Pinckney, "William E. Borah: Critic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tudies on the Left*, I (No. 3, 1960).

⁴⁰ Jesse Lemis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up," in Barton Bernstein, ed., *Toward A New Past: 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8), pp. 3-29.

⁴¹ Staughton Lynd, *Anti-Federalism in Dutchess County, New York* (Chicago, 1962).

⁴² Michael A. LeBowitz, "The Jacksonians: Paradox Lost?" in Bernstein, ed., *Toward A New Past*, pp. 65-84.

時代美國的政治雖漸趨平等，但社會却隨着工業化的推進越來越不平等，出現工業資本家與工人無產階級的對立。⁴³ Norman Pollack 在其農民運動的研究中也特別強調工業化對農民發生的不利影響。他完全推翻 Hofstadter 認為農民運動是一保守運動的看法。他指出鐵路公司在運費上的差別待遇與大企業組合的巨大壟斷力量，對農民的經濟確確實實的有害，並非如 Hofstadter 所說的只是幻覺。他也指出農民們清楚的了解工廠裏機器生產的慘無人道，因而對工人極端的同情。農民運動的主張是激進的，因為他們並不想消滅工業與機器，而是要求政府干與以使工業與機器能真正的為社會造福。⁴⁴ Pollack 雖為農民運動激進性作辯護，但他的研究引不起年輕激進份子的多大歡迎，因為在他們看起來農民是屬於小資產階級，不是他們所同情的下等無助階級。由於他們對中產階級的反感，因此連中產階級所領導的進步運動也受到嘲弄。Gabriel Kolko 直指進步運動是一大騙局。那一堆的進步法案表面的目的是管理工商業以增進羣體福利，但事實上是由工商界人士所促成的，其目的在防止毀滅性的競爭。進步黨空洞的活動以及華而不實的諾言，最後使真正的激進社會改造失敗。⁴⁵ 新左派史學家對羅斯福新政 (The New Deal) 的研究不多，但從 Bernstein 的 “The New Deal: the Conservative Achievements of Liberal Reform”⁴⁶ 一文中我們可以窺見其批評的態度。他認為新政只是在維持與保護美國的傳統制度——資本主義。它的一切措施都是在協助中上階級。它沒有改善窮人的生活，沒有重新分配收入，也沒有促進平等與消滅種族歧視與隔離，更沒有迫使工商界使之更符合社會福利或限制工商大亨們的巨大政治影響力。所以新政的一點點改革努力並沒有造

⁴³ Douglas T. Miller, *The Jacksonian Aristocracy* (New York, 1967).

⁴⁴ Norman Pollack, *The Populist Response to Industri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62).

⁴⁵ Gabriel Kolko, *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900-1916* (New York, 1963).

⁴⁶ In Bernstein, ed., *Toward a New Past*, pp 263-282.

成真正的平等與公平，很多窮而低下的人完全被忽略。爲了協助中上階級，新政有時甚至不惜犧牲下等階級的利益。但是新政的華美言辭却引誘這些窮人支持羅斯福的政府。Bernstein不但爲新政樹立起階級的對立，而且也暗示新政是另外一個政治騙局。

由以上所舉數例我們可以看出新左派史學家大體上是站在同情弱小的立場上來重新檢討美國歷史。由於同情弱小，他們不但重彈階級對立的老調，而且也猛烈的攻擊上層社會及其一切。像這種從一個先設的立場來研究歷史，難望他們的態度會如何的客觀冷靜。正像進步派史學家一樣，主觀與當代主義使他們不能避免曲解歷史以符合先入之見的偏失。其作品中固然不乏佳作，但也有許多只不過是政治口號的吶喊而已。新左派史學目前還只是在萌芽階段，當其更趨成熟時，它是否在研究態度上也能更趨客觀冷靜呢？在連新左派史學是否能成爲美國史學主流都不可知的今天，有關此一問題的答案只有留待各人去猜測了。

結 論

美國歷史研究的發展是一大而複雜的問題，絕非短短一兩萬字所能細論，但僅就此概括的介紹，我們已可知美國史學研究的發展與客觀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客觀環境改變時，一般思潮也隨之而變，歷史的研究隨之出現新的方向。單就此而論，進步派史學之強調主觀性與環境相對論似乎大有道理，至少美國歷史研究的發展似乎給以有力的證明。難道客觀的研究態度與客觀的歷史真如 Beard 所說的只是一個「美麗的夢想」嗎？